

仓门口孙家胡同与甲骨文的发现

——匾额文史之五十六

吴裕成

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,大量出土于商代后期都城所在地河南安阳殷墟。在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,展板并列两位最初辨识者王懿荣、王襄的照片:“1899年,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对有字甲骨作了初步的鉴定,并先后从古董商人那里购得1400多片甲骨。王襄也是较早识别与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之一,1920年所著《簠室殷契类纂》是最早的一部甲骨文字典。”展板还介绍王襄所著《簠室殷契征文》,惜未涉及当年发现甲骨文的细节。

王襄的著述,多次言及与书法家孟广慧初识甲骨文的经过,曾写道:“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,即前清光绪二十四年。潍友范寿轩售古器物来,言河南汤阴(实安阳)出骨版(实龟甲兽骨),中有文字,征询吾人欲得之否?时有乡人孟定生共话,极怂恿其往购,且言欲得之。孟氏意此骨版为古之简册也。翌年十月,范君来,告以得古骨版,期吾侪到彼寄所观览。彼寓西门外马家店,店甚简陋,土室壁立,窗小于窠,炕敷苇席。群坐其间,出所谓骨版者,相共摩挲,所见大小不一,沙尘满体,字出刀刻。既定其物,复审其文,知为三古遗品。与之议定价格,骨之巨者,一字一金,小以块计值。孟氏与襄皆寒士,各就力所能得者收之而已。所余之骨版,据云尽售诸王廉生,得价三千金……”关于最早辨识甲骨文,这是扼要而又不乏细节的实记。孟广慧字定生。王廉生即王懿荣。

那以前,在安阳小屯村,“地面常有此种骨片”,犁地或掘井“所出物件尤多”,并“无人宝藏”。那位名字写进甲骨文史话的古董商,也是“见而未收,亦不知其贵”。范寿轩来津,到王襄家推销古董,说起带字骨版,听到“古之简册”的判断,并被鼓动前去收购,时为1898年冬。三个季度后,1899年秋范寿轩已收购到一批甲骨,携带来天津,就有了西门外马家店那一幕。历史需要记住甲骨文的发现。马家店成为重要遗址,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。

王襄是天津老城里人,住过三个地方,都在东门里。他出生于二道街贡院胡同,6岁迁居仓门口内路西孙家胡同(1982年改名崇志胡同),25岁搬家至大刘家胡同。1898年冬,王襄、孟广慧接待古董商人范寿轩,判断所谓“骨版”为“古简”,是在王襄家。这是发现甲骨文字的序曲。其时王襄住哪?据王成《我的祖父王襄》记,住孙家胡同,与仓门口教堂一墙之隔。也在这年,23岁的王襄考入县学,做了秀才。

仓门口内路西孙家胡同王宅,在1899年秋,收藏了中国最初的辨识出文字的甲骨。1900年7月,城里遭八国联军炮击,宅院中弹被毁。战乱后,王家搬到与仓门口隔街斜对的大刘家胡同。

社会在变化。科举废除,读《字学举隅》的王襄,同时也读《代数备旨》《化学辨质》《英文类要》。1905年他报考清廷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,预科两年,专科

三年,1910年毕业,“奖给举人,尽先补用知县,分省河南”。转年他去了河南,“经历候补况味,遂绝意仕进”。1914年入职长芦盐务,到滦州的石碑支所任职。1921年调福建盐务稽核所,从此各处任职,诗作先后辑为《入蜀诗草》《越中吟》《泽畔吟》《越吟续稿》。1936年调回长芦,诗辑题名《归田谣》。1939年,辞职家居。曾书陆游“此处(地)天教著放翁”句为横额,并题“陆放翁生当南宋,不忘汴京版图,其爱国挚诚形于歌咏”。1949年,74岁的王襄赋诗“万方解放民更始”,礼赞新时代。王襄在1953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,曾任市政协委员。他将多年收藏的甲骨捐献国家,留在天津博物馆的,有1161片。

王襄为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付出毕生心血,直至垂暮之年。两部重要著作《簠室殷契类纂》《簠室殷契征文》,分别于1920年、1925年由天津河北博物院出版。1910年还是在校生时,撰写《题甲子表》一文,说到宋代以来金文“子”“巳”字形的争论。所言即十二地支“双子”话题。上世纪30年代,郭沫若《释支干》借助殷契材料,推想十二地支与生肖的来源,将此“双子”视为“重要之关键”。

王襄在城里大刘家胡同居住了57年,曾作《题簠室横额》讲述匾额情趣,“斋名以所藏古器物命之,殆将十数,若簠室、符斋、古龟轩云云……实则一斋一厅,岁时易其题额”。82岁时,王襄迁入市政府在睦南道安排的新居。

津门“时尚才女”

章用秀

在20世纪30年代的《北洋画报》等天津报刊,常见到一名叫邵芳的女性倩影和她优美动人的绘画作品。1934至1936年间,《北洋画报》刊登过四张她16至18岁时的照片,并称之为“本市名闺”。1935年8月16日,《大公报》上登载的第六届全运会河北女子垒球队名单上,邵芳作为“一号”选手赫然在列,俨然成为津门的“时尚才女”。

邵芳1918年生于江苏常州,其父时任天津邮局局长,外公屠振初是天津六大纺织厂之一宝成纱厂经理。在她九岁时,其父英年早逝,母亲遂将她寄住在外公家,舅父们都毕业于国内外的名牌大学。邵芳梦想成为一名运动选手,常到英租界的球场苦练垒球。

邵芳艺术天分颇高。17岁在天津圣功女中毕业后,她便投师湖社画家陈少梅门下,自此六年画笔不辍,成为陈的得意门生,并任陈少梅的助教,被同门谑称为“大师兄”。陈将指导新师妹的任务交付她,师徒也常有合作。1946年,邵芳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。徐悲鸿、常书鸿、陈之佛、宗白华、胡小石诸多名流曾联名撰文,赞“其画古雅典,则而有恬淡冲和之气,非世之任意涂抹,徒骇俗目者比也”。

王襄与冷枫诗社

吴蓬莱

王襄的甲骨文研究,很长时间里主要靠业余治学。1914年,年近不惑的王襄入职长芦盐务。先在冀东石碑盐场稽核支所,后被外派,四方奔走,开始作诗,先后辑为《入蜀诗草》《越中吟》《泽畔吟》《越吟续稿》。

1936年,王襄调回天津长芦盐务稽核所。这年底,天津冷枫诗社成立。王襄写过一首《招李君入冷枫诗社》诗:“缅怀风雅宗,惠然肯来否?”他的《次韵张异荪丁丑除夕见赠》:“放眼河山巨可悲,人间非复太平时。私心有恨空填海,束手无言且咏诗。”表达忧国忧民情怀。诗友张异荪,是冷枫诗社发起人之一。王襄参与冷枫诗社活动,《秋柳》《秋草》均为“冷枫诗课”所得。1939年作《己卯上元节冷枫诗社同人宴集得座字》,有句“极目旧河山,忧心悲破碎”,面对日寇的侵略,满腔悲愤入诗篇。

津门书法家赵幼梅是王襄敬重的老师。赵幼梅诗赠冷枫社员,王襄原韵奉和,“一代推宗匠,高风仰我师”。王襄另一句诗“冷枫诗社君主盟”,写出赵幼梅对冷枫诗社的影响。

天津早期的电冰箱

曲振明

电冰箱初现天津,皆为舶来品。早年的《天津商报》曾公布各家洋行经营的电冰箱牌号,有“福尔班茂司”“惟是顶好”“奇异”“司派登”“南极”“飞洁爱”等。其中“惟是顶好”是彼时畅销全球的品牌。

早期的电冰箱价格高昂,一般商家和消费者承受不起,最初多为外国人经营的餐厅使用,如起士林、利顺德、达克饭店、正昌饭店、回力球场餐厅、莎卫饭店等。1936年10月,几个外国人在天津开设一家仁太电冰箱公司,营业所在英租界,工厂在特一区无锡路3号,分机械、木匠、喷漆、电器、装配、管理六部,雇佣工人80余人。据说三个月出售了120台,销往北平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青岛、济南、大连、香港等地。仁太电冰箱有商用和家用之分,还可以应客户需要定制。由于多用中国人工与材料,其标榜“国产电气冰箱”,价格不及舶来品的一半,为此受到市场欢迎。

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,仁太公司持续衰败,不久被侵华日军强行吞并。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暖水瓶

一 镜文并摄

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几年,不记得家里有暖水瓶,好像每次喝开水都在吃饭之后,也就是大人做饭时顺便烧一锅开水,除了够喝以外,再灌满一只大号白瓷壶备用。这只白瓷壶卧在特制的保温壶套里,严丝合缝,只探出个壶嘴来。如果再需开水,就得到附近的水铺去买。

回到父母身边以后,我发现家里多了一把竹编暖水瓶,可是他们总是吓唬我,说那个东西一旦爆炸就能把人烫伤,还把暖水瓶东躲西藏,最后挪到了我够不着的桌子上。记得那把竹编暖水瓶是飞马牌的,用来用去外套变成了土灰色,底部的木头十字架被水沤得发黑发糟,到后来,握着



暖水瓶的竹把儿时,都怕瓶胆坠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,竹编暖水瓶实在不能保温了,母亲就带着我到百货铺买了新暖水瓶。那时还没流行铁皮印花暖水瓶,竹编暖水瓶依然是唯一的选择。

挑选暖水瓶时,售货员先拔开瓶塞儿,然后把耳朵贴在瓶口上听声音,他认为没问题再交给顾客听一听——“嗡嗡”的回声

越大,瓶胆质量越好。头几天,沏完开水后要观察暖水瓶外表发不发热,如果温度过高说明保温欠佳,就可以到百货铺去更换。

20世纪80年代,竹编暖水瓶仍在工厂机关使用,新婚家庭普遍使用“红双喜”铁皮印花暖水瓶。那时,办喜事收的贺礼中,有三四对暖水瓶,已不足为奇。